

江西党史论集

江西党史现代史学会选编



一九八三年四月

序 言

江西省现代史、党史学会成立以来，在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在省委重视关怀下，我会会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积极开展现代史、党史研究，特别是对二战时期中央根据地、湘赣、湘鄂赣、闽浙皖赣等根据地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研究，搜集整理了几百万字的资料，撰写了数百篇论文。这些研究成果，有些我们已陆续编成专集出版，如《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三册、《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一册、《南昌青年运动史回忆录》一册，有些已收入全国党史人物传内，更多的散见于省内外各报刊杂志。研究活动的深入发展，反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我省科研战线上的胜利。

为了检阅我会三年来的研究成果、鼓励会员刻苦钻研积极写作，为四化多做贡献，我们将有一定创见、质量较高而未收入专集的论文选编三十二篇成册。限于篇幅，未能尽收，特此说明。

江西省现代史学会

江西中共党史学会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序 言

回忆大革命时期江西党的活动·····	方志纯	(1)
改造社及其革命活动·····	刘勉钰等	(17)
江西地方党团组建史略·····	坚毅	(36)
安源工运是我党集体奋斗的光辉范例·····	邓启沛	(48)
究竟谁代表安源路矿工人谈判 并签订十三条的? ·····	宋俊生	(64)
北伐战争中的江西战场·····	周銮书等	(70)
关于A B团几个问题的探讨·····	文耀奎	(97)
关于南昌起义若干史实的补充校正·····	李元勋等	(109)
南昌起义的准备会议——庐山会议史探·····	罗时叙	(122)
究竟何时确定井冈山为革命根据地? ·····	宋俊生	(134)
井冈山斗争史宣传中的一个原则问题·····	吴云俊	(143)
论万安暴动·····	戴向青	(152)
从弋横暴动看方志敏式根据地的形成·····	李元勋等	(172)
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特点之我见·····	唐志全	(182)
方志敏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杨华履	(196)
略谈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陈荣华	(203)
论富田事变·····	戴向青	(221)
红三军团一打长沙的再探讨·····	李元勋	(247)
论罗坊会议·····	戴向青	(256)

试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 诞生及其历史意义·····	陈荣华等	(281)
陈云同志在中央苏区从事经济工作的 科学态度·····	余伯流	(305)
重评中央苏区“查田运动”·····	余伯流	(316)
我党历史上一场错误的党内斗争·····	夏道汉	(334)
土地革命时期江西苏区新设县考略·····	邵天柱	(352)
对第五次反“围剿”两个战略性建议之管见·····	何友良	(366)
湘鄂赣红军游击队的改编·····	邱逸桥等	(378)
杨文翰游击队及其历史教训·····	石作林等	(391)
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最高形式·····	张传贤	(404)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几个问题·····	坚 毅	(413)
我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陈金榜	(427)
试论建国初期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性质·····	匡萃坚	(444)
略论加强党史课中的理论教学 的几个问题·····	黄干周等	(460)

回忆大革命时期江西党的活动

方 志 纯

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九周年了。

今天，党的旗帜正指引着江西人民在新长征的路上阔步前进。在纪念党的诞辰的日子里，我不禁又回忆起江西的党组织创建时期的艰难岁月；回忆起大革命时期江西的党组织领导江西人民英勇斗争的难忘情景。

江 西 改 造 社

“五·四”运动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江西南昌第二中学（文化大革命前南昌一中院内）的几个进步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进步的社会团体——鄱阳湖社。发起和最早参加这个团体的有袁玉冰、黄道、石廷瑜、徐先兆等八人。后来袁玉冰告诉我说，之所以取名“鄱阳湖社”，是因为鄱阳湖乃江西最大的湖，它既容纳百川，又终归大海。

鄱阳湖社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规划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改名为改造社，并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了改造社成立大会。大会是在二中召开的，由袁玉冰主持并讲了话。

改造社社址就在南昌二中，当时的门牌号是系马桩公字十号。

改造社的宗旨是“改造社会”，“使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

改造社成立后，向往者云集。一九二二年又有邹秀峰、吴先民、李穆、涂振农、洪宏义、方志敏、张朝燮、江宗海、汪群、张石樵等人先后参加。这时，因为改造社社员中一些主要骨干都到北京求学，于是，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设立了总社，并决定在南昌及上海设分社。此外，长沙、常德、横峰、贵溪、河口、日本等地，都散布有改造社社员。

改造社的社刊是《新江西》，由袁玉冰主编。《新江西》的内容是刊登有关“社会研究、社会批评、社会调查”方面的稿件。江西改造社成员，曾以《新江西》为阵地，开展过“主义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争论。前者实际上是要不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后者实际上是要不要参加革命实际活动的问题。在争论中，袁玉冰等人指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他说：没有主义的信仰是最危险不过的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急进中的能够实现的主义，只要看他主张非妥协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很可以坚我们的信仰了。但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是拿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因此，袁玉冰又说，我们千万不要犯经院派的毛病，不注意中国的社会实际。如果这样空谈理论，那自然是虚空中的虚空了。

《新江西》从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创刊后，只出了三期，就被反动当局查禁了。随后，改造社又决定由南昌分社出《青年声》。后来，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旅居上海、南京等地的改造社社员，又以《新江西》为名创办了一个刊物。该刊出过两期专刊，一期是欢迎袁玉冰出狱，一期是追悼列

宁逝世。

江西改造社虽人数不多，但组织严密，对社员要求比较严格，所以战斗力较强，在反对江西军阀统治和传播新文化特别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是起过推动作用的。改造社的成员，后来有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改造社对江西党团的创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南 昌 文 化 书 社

江西改造社的主要负责人袁玉冰，是一九二二年在北大读书时认识李大钊后入党的。江西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赵醒侬是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入团后转党的。方志敏是一九二二年在上海经赵醒侬介绍入团的。由于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经党团组织决定，一九二二年下半年，袁玉冰、赵醒侬、方志敏等在北京、上海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陆续回江西开展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为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赵醒侬、方志敏等同志决定开办书店，这样既有公开身份，便于宣传革命思想；又有活动场所，便于党、团员秘密联络。经过简单的筹备后，一九二三年一月，由袁玉冰、洪宏义、方志敏、王立生、赵醒侬、徐先兆等十五人为组织者，正式开办了南昌文化书社。文化书社的主要负责人是方志敏。

方志敏为南昌文化书社草拟了《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宣言》说：荒凉的江西，没有文化种子的江西，居然也有“文化之芽”了！但是，发生于这个“不毛之地”的“文化之芽”，虽不至于枯萎去，也怕不能蓬蓬勃勃地长起来。那

么，就应该用人工的灌溉法，从别处运输一些水来供给它的需要。因此，南昌文化书社的宗旨就是灌输新文化。

南昌文化书社，除经营当时一般书店都有的文学、社会、历史等书外，还大量销售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及《向导》、《先驱》等革命书籍和进步刊物。南昌文化书社的开办，为在江西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南昌文化书社的地址在百花洲三道桥东湖边上的一间小平房里（文化大革命前南昌市税务局院内），房子很小，大约只有二十来个平方，里边摆了一个玻璃柜台，书都摆在柜台内外，房子后面有个小门通外边，进出很方便。这样，南昌文化书社就不仅成了一个宣传阵地，也成了一个革命活动的秘密场所。党团组织曾经在来这里买书的顾客中，物色过积极分子的对象，也有不少向往革命的青年，在这里和团组织取得了联系；袁玉冰、赵醒侖、方志敏等党、团员，更是经常在这里秘密联络，商讨工作。

随着党、团员的秘密活动及文化书社的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民主的思想、爱国的思想、各种进步的思想、逐渐在江西传播开来。为了更好地把倾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由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赵醒侖、袁玉冰、方志敏、曾天宇、邹努等人发起，于一九二三年二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了便于公开活动，“研究会”以学术研究性团体的面目出现，指导革命青年读马列的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俄国十月革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研究会的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团员。为了团结江西各阶层人民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赵醒侖、袁玉冰、方志敏

等同志又组织了“民权运动大同盟”，“同盟”的成员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社会人士，公开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这两个组织的成员，经常在文化书社集会、活动。

南昌文化书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民权运动大同盟的明显进步倾向，不可避免要受到反动当局的干涉和镇压。一九二三年三月，江西督军蔡成勋下令，禁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两个团体开展活动，同时，查封了南昌文化书社，并无理逮捕了袁玉冰同志交军法处审讯。在这种情况下，赵醒侗、方志敏等被迫离开南昌到上海。袁玉冰同志一直到同年十一月才交保释放，随即也到了上海。当时，江西旅沪各界进步人士，曾在上海开会欢迎袁玉冰同志，并出了欢迎专刊。

《 红 灯 》

在赵醒侗、袁玉冰、方志敏、曾天宇等同志的发动和组织领导下，江西（特别是南昌地区）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学校都有了团员。为了加强组织领导，于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临时委员会，由赵醒侗同志任临时团地委书记。同年十二月，正式成立共青团南昌地方委员会，赵醒侗同志任书记。同时，创办了团地委机关刊物——《红灯》。

《红灯》是袁玉冰同志主持创办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袁玉冰出狱后，斗志更旺。经党、团组织决定，他和崔豪等人一起，编辑出版了团地委的机关刊物《红灯》。但是，当时只出了一期就由于政治的经济的及其他许多复杂的原因

而停刊了。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共青团江西省委成立，袁玉冰同志任书记。于是，《红灯》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三日复刊。袁玉冰高兴地说：我们卷土重来，又燃起我们的《红灯》了。

《红灯》从复刊起，至七月十六日止，共出了十五期，每期十六页，三十二开本。封面画的是一个手电筒，射出红色的光芒。《红灯》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革命，评论时局。一九二七年五月，袁玉冰同志曾作过一个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长篇讲演，《红灯》曾有过详细的摘录。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也经常写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红灯》上发表。当时，对于江西省内外的大事，如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南昌市人民群众“四·二”反右派斗争、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陈赞贤同志遇难等，《红灯》都有评论文章。正因为如此，《红灯》受到了广大革命青年的欢迎，发行量由数百份增至五千余份，这在当时只有十来万人口的南昌，是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了。

《红灯》的责任编辑是崔豪、吴季冰、徐先兆等人。崔豪是南昌二中的团员，毕业后在北京大学求学，北伐军进入江西后，投笔从戎，随军北上不到一个月便牺牲了。吴季冰同志是共青团九江地区的负责人，调团省委工作后参加《红灯》的工作，他后来在南京雨花台牺牲。

《红灯》，是我参加革命后接触到的第一个革命刊物。当年，我是《红灯》的热心读者，《红灯》曾向我灌输革命理论，启迪我正确分析形势，帮助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许多革命青年一样，《红灯》曾经是指引我前进的一盏指路明灯。

黎明中学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一大”后，革命统一战线迅速扩大和发展，江西的革命形势也日益高涨起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建立江西党的组织的工作，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一九二四年二、三月间，赵醒侗代表江西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后回到江西。接着，方志敏、袁玉冰、曾天宇、罗石冰等共产党员，也先后来到江西工作。他们回南昌后，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为基础，吸收了一些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团员如冯任、肖国华、邹努等人入党，着手建立江西党的组织。

二月底，中共江西特别支部正式成立，江西特支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赵醒侗同志为支部书记，机关地址在解家厂（今九江路南侧、道德观旁边、南昌十九中对面），赵醒侗同志就住在这里。

特支成立后，为了训练干部、宣传革命思想和掩护党的活动，决定筹办一家书店和一所中学。

六月，书店开始营业，叫明星书店，经理是曾天宇同志，地点是在百花洲旁边的锡厂（今中山路上百花洲横街北口）。书店的房子原来是一家茶馆，地处闹市区，可以闹中取静，不惹人注目。同时，该房有楼，楼上有窗户，原来大概是为茶客观景的，正好可以作瞭望哨。楼下卖书，楼上住人，每当党、团组织在这里活动时，派人往窗口一坐，四面街上的情景就尽收眼底了，稍有嫌疑动向，即可采取紧急措施。

黎明中学的筹备时间稍长一点，因为为便于教育当局立案和开展革命活动，需要有一个有名望的校长。后来，我党通过上层关系，聘请了江西省议会议长龙钦海先生为名誉校长，该校的筹办工作便顺利进行了。

黎明中学的校址在解家厂，离特支所在地不远。一九二四年秋，黎明中学开始招生，我就是在这以前调到南昌来的。到南昌后，我的公开身份是赵醒侬家里的厨子，实际上是党的机关的炊事员、勤杂员兼机要交通员，为便于查户口起见，又在黎明中学挂了个名，算是黎明中学的学生。

一九二四年秋，黎明中学的学生只有一个班，大约五、六十人，一九二五年春又招收了一个班，共一百二十余人。学生虽说是招收的，但实际上大部分是保送的，都比较进步，团员占绝大多数。

黎明中学表面上和其它学校一样，有国文、历史、地理、英文、体育等课程，但实际上学生在这里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党的负责人经常在这里作形势报告，讲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学校中的党团员，在这里忙于党的机关的文字宣传工作，党的许多文件都是在这里书写、印刷的。每逢“五·一”、“五·四”、“五·五”（马克思诞辰）、“十一·七”（十月革命节）等重大节日，学生都走出校门，到其它学校去串联，宣传革命理论和发展学生运动。因此，这所学校实际上是大革命时期江西党组织的干部学校。从这里输送了一些优秀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苏联去学习，并输送了一批干部到各地从事党的革命工作。

黎明中学又是当时江西党组织的活动中心。党的许多会

议及党的负责人的联络，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许多重大活动（如一九二四年七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成立会议、国民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都在这里进行。中共中央和江西党组织的许多负责人，如恽代英、赵醒侬、袁玉冰、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均在黎明中学作过报告，或讲课、讲演过，有的还在学校兼过课。

黎明中学开办后，北洋军阀当局就嗅到了该校可能有革命活动，对黎明中学进行了严密注视。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外校有个进步学生被捕后，供出黎明中学有进步学生的组织。于是，军阀当局立即查封了黎明中学。后来，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各地需要大批干部，黎明中学的学生也无心读书，便派往各地去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去了。

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及“沪案后援会”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

当时，中共江西特支已改为中共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罗石冰、赵醒侬同志先后任书记。在中共江西地委及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发动和领导下，江西的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活动，将革命群众运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三月二十一日，江西各界联合组织成立了孙中山追悼大会筹备处。不几日，又召开了江西省及南昌市各界人民悼念孙中山先生的追悼大会。大会是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名义召开的。大会会场设在皇殿侧的广场上，在广场的北端，用竹子及篾席棚搭了个祭台，作为灵堂。祭台的正中，挂着孙

中山先生的遗像（像是国民党中央发下来的），祭台的四周，是各界及知名人士送的挽联及挽幛。

追悼会这天，天低云暗。各单位群众约四、五千人很早就排着队伍到会场来了，中共的同志都分头插在这些队伍中。在追悼会上，工、农、商、学、妇女各界代表发了言。赵醒侗同志也发了言。追悼会后，散发了孙中山先生遗嘱和国民党“一大”宣言。这个大会结束后，陆陆续续还有不少团体、单位、个人到皇殿侧来参加追悼会。于是，我们又组织他们一批一批地举行悼念活动，一直进行到下午两点多钟。这一天，参加追悼会的人数，约在一万左右。

在南昌开追悼会前后，各县（特别是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县）都先后举行了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或其他形式的悼念活动。

在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的过程中，中共江西地委及团地委，指示各地的党、团员，深入发动群众，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宣传群众，在为实现孙中山先生遗嘱而努力的口号下，群众反军阀的革命积极性进一步高涨起来。

就在这时，“五卅”运动爆发了，反帝民族革命运动遍及全国。这次运动在江西也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运动一开始，南昌、九江等地马上形成了抗议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工人的浪潮，并于六月三日，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后改为沪案后援会）。

六月五日，后援会组织各界群众召开了声援大会，国民党、工会、农会、妇联、学联、商会等党群团体参加大会并向上海发了声援通电。赵醒侗同志在会上强烈谴责了英、日帝国主义屠杀我国同胞的罪行，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为

收回租界而斗争。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虽然，大会期间军警想捣乱，但慑于群众的愤怒情绪和浩大的革命声势，没有敢轻举妄动。

江西党、团组织积极参加和领导了沪案后援会的工作。当时，适逢学校放暑假，党、团组织研究决定，乘学生放假回家之机，党、团员组织和带领学生下乡宣传，将革命思想灌输到基层去。在党、团员的带动下，除豫章、葆灵两所中学外，其他学校的学生都踊跃下乡，进行宣传。

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和“五卅”运动后，由于中共的帮助和中共党员的努力，江西各地的国民党组织开始建立起来，至一九二五年七月，全省已有十多个县、市建立了国民党县、市党部。于是，召开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赵醒侬、方志敏、张朝燮、邓鹤鸣等七人，被选为省党部执委。这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便在江西正式形成，它预示着江西的革命将要迎来一个新的高潮。

北 伐 前 后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北上征讨军阀的《北伐宣言》。七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十二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各阶层革命群众巩固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汀泗桥战斗胜利后，北伐军总司令部命令右翼部队出师江西，讨伐孙传芳、邓如琢。右翼军指挥朱培德，以第二、三军进赣西、第六军进修水、第一军

第一师进铜鼓，开始了向江西的进军。

为了加强对江西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在北伐后派陈奇涵同志回赣南工作，派刘九峰等一大批干部来南昌充实中共江西地委的领导。中共江西地委对迎接北伐战争的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派冯任同志去九江，领导工人支援北伐战争；派出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三十余人，分赴二十余县从事农民运动；发动各学校的学生进行宣传工作，等等。在党的领导下，一些群众运动基础较好的地方，秘密组织了运输队、向导队等参战组织，为北伐军向江西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二六年九月中旬，北伐军进江西后，节节胜利，已对南昌形成合围之势。这时，国民党中央又发下许多有关北伐的宣传品。党、团组织利用分发、张贴宣传传单的机会，又动员学生在南昌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宣传活动，使群众了解北伐的伟大胜利，鼓舞革命斗志，削弱军阀部队的士气。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九日，北伐军第六军先头部队一个师，从奉新方面突破敌人防线，攻进南昌。后因敌人反攻及北伐军后续部队未跟上，进城部队又于二十四日退出南昌。驻扎在新建生米街一带。记得当时南昌市群众中流传的一首顺口溜，形象地描绘了北伐军进城的威风及北洋军阀部队的狼狈相：“民国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广东北伐军，来把南昌夺。邓如琢，听到讯，吓得一身胆缩缩。准备大军来接火，‘噗昧’、‘噗昧’，手忙脚乱打不着，革命军，放大炮，打得北兵冒地方躲。邓如琢，打败了仗，逃到上海吃‘落壳’。”（“落壳”，南昌方言，即受上司训斥的意思）。

北伐军这次进城，由于时间短，军队的党组织未能与地

方党取得联系。部队撤退后，组织上曾派我和邵式平同志，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名义，前去生米街和部队联系过。

从一九二六年九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的一个多月里，北伐军与军阀孙传芳部在南浔线一带激战月余，终于歼灭孙传芳主力十余万，取得了江西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十一月六日，北伐军攻克牛行车站后渡河，于七日攻南昌市郊，北洋军阀南昌守将唐福山（师长），企图从鄱阳湖上逃窜，在七里街战败被俘，八日，北伐军正式进驻南昌城。

北伐军进南昌后，国民党的活动由地下转为公开，挂起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牌子，并将省党部搬入原省督军公署衙门内（今长征路市革委院内）办公。同时，建立起江西省临时政权机关——江西政务委员会。

早在北伐军进入江西前，中共江西地委就在着手筹建省委。赵醒侬被捕时，解家厂党的机关也遭到破坏。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赵醒侬遇难后，地委机关即秘密迁入洪恩桥（今三道桥百花洲电影院旁边）。北伐军占领南昌后，在中央的指示下，中共江西省委便正式建立起来，省委书记为刘九峰，省委委员有傅烈、袁玉冰、罗石冰、邹努、杨超、王环心、冯任等同志。省委成立后，将党员人数及党支部较多的吉安、九江两地党组织改为特委。除赣南、赣东北等地外，党在南昌市的支部有：一师、一中、二中、女师、女子职业学校、南浔路、电厂、南昌码头等单位。

在江西省委的领导下，乘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大好形势，江西的工农运动进一步蓬勃发展。这时，建立了全省的工会、农会筹备处，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迅速增加，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其他各界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各界群